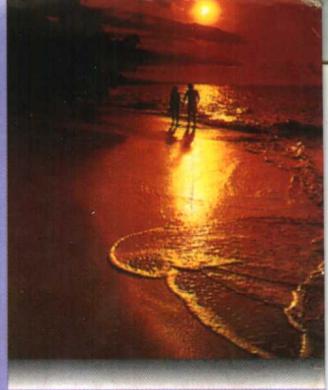


董月玲 著



生命不败

—董月玲纪实作品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走笔万水千山

——探幽鲜为人知的
世界



搜寻茫茫人海

——聚焦普通人不普
通的命运

目 录

一、青春与梦想	1
1. 202路有轨电车	3
2. 北京女记者与陕北歌王	12
3. 魂断白云山	21
4. 西北穷汉子的文学梦	30
 二、人性之光	 43
5. 镜头里的世界	45
6. 卖大饼发家的黄大妈	56
7. 捡破烂老汉的善举	66
 三、生命不败	 77
8. 极限人生	79
9. 电子喉教授	92
10. 霍熙亮的敦煌情结	103
 四、社会聚焦	 117
11. 跟胡富国走山西	119
12. 前村除霸	132
13. 世纪之战	142

五、活着的历史	157
14. 他们曾是战犯		
——寻访战争幸存者之一	159
15. 第十二次寻罪		
——寻访战争幸存者之二	169
16. “八·一五”拭目看东京		
——寻访战争幸存者之三	180
六、走入自然	191
17. 在大兴安岭旅行	193
18. 鄂伦春人最后的狩猎	203
19. 深山里的绿色人家	214
20. 遭遇洪水(一)	224
21. 遭遇洪水(二)	230
22.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239
23. 女子沙漠探险队	249

一、青春与梦想

202 路有轨电车

孙福娟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声，挨打的半边脸又胀又麻，她失去了痛感，内心最强烈的感受是惊愕，继而是失望，血正沿着她的嘴角滴滴哒地流到棉袄上。一个山区姑娘长久以来的城市梦想，瞬间就被这四记重拳无情地击碎。她跌坐在车务员的小凳子上，伤心地大哭起来。

“回家去！”这个念头在她的脑子里固执地出现着。但她并没真地回青山沟的老家去。孙福娟是大连电车公司五一路车场的打工妹，她们与公司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她只能继续留在这座城市里，在 202 路有轨电车的线路上，重复着三班倒的车务员生活。

“老家人可羡慕了”

1994 年岁尾，大年三十凌晨 3 时 30 分，气温零下 7 摄氏度。

我再次拉了拉围巾，紧紧裹住面部，在头天晚上选择好的路线上匆匆地走着，并警觉着周围的动静。

拐上了一条街灯稍亮的大马路，街上仍无车也无行人。离老远，我就听到了一个人的咳嗽声，然后过来一辆驮着人的自行车，我们几乎是同时到达了大连电车公司五一路车场，第一个上早班的姑娘，就是这样让家人用自行车驮来的。

我们都站在车场门口，一盏昏黄的灯使我们看不清彼此的脸。没等太长时间，就见两人影相伴，从对面匆匆而来，是于翠艳和她

老对儿，车务员都把同车的搭档称作“老对儿”。打工妹们省去了上早班让人接送的麻烦，她们住的集体宿舍离车场只隔着一条马路，上周我去她们宿舍采访时，说过要跟她们上趟早班，但看见我真地站在车场门口，她俩仍有点意外：“你是怎么来的？”

这时，打更的老师傅推开车场的大门，里边停满了电车，黑暗中，它们就像是一群仍在沉睡的大型动物。如今大连市只剩下三路有轨电车，五一路车场就有两路，打工妹们所在的202路一车队，今天上早班。

于翠艳和她老对儿进了票房，领了皮包、票、五块钱的本钱，然后上了1028号电车，扫地，抹玻璃。4时5分，202路第一班有轨电车发车了，于翠艳和她老对儿，一个拉车弓，一个扳道岔，干得熟练麻利，她俩都没吃早饭。这条线一共11站，从兴工街到黑石礁，于翠艳她们在这个班上要跑够9圈，中午才能下班。

北方冬天的凌晨，黑而寒冷。

行驶中的老式电车响声大作，铁轨和车轮磨擦着，发出“哐哐锵锵、哐哐锵锵”的声响，车厢里的木壁、窗玻璃、铁扶手也被震得叮里咣啷地直响，说话时，要嘴巴对着耳朵，且要大声才能听清。

车到了起点站兴工街，司机从车厢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改变行驶方向，老式电车两头都可以开。一连几站都没有乘客，于翠艳不断地喊：“走，司机。”电车便一一过了这些站台。

我和她们已经聊过几个晚上了。

五一路车场的打工妹都来自辽宁宽甸县，前后招了四批，现在有46人。来车场打工前，她们可从来没见过老式电车是什么样。

去年初的一天，家住宽甸县青山沟滴水砬子村的孙福娟，见家里来了一个中年男人，她爸对她说：这是你刁叔，再早在咱们村插队时，住在咱们家。刁绍全如今是大连市公共电车公司总经理，这么着，孙福娟和姐姐孙福梅、表姐孙福霞，分别于第二、第三批，上了202路有轨电车。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车场宿舍，我坐在孙福娟的床上，这间宿舍住的全是滴水砬子村的姑娘，大都是1977—1978年生。谈到她们的家乡，立刻有人从枕头下边翻出一张青山沟旅游图，她说带着这张图，是为了想家时看上一眼。青山沟在宽甸北部山区，有大小瀑布36条和上下达百里的青山湖。看着那一幅幅清清爽爽的照片，听着她们热情的叙述，我似乎都能闻到山涧里草木的气味，听见飞瀑的响水声。青山沟是一个尚没被污染，有着真山真水、秀美纯朴的地方。

像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一样，她们也是抱着那么一种愿望来到城市：到大城市看看、闯闯。

“俺们村，可不像你们城里人想象得那么穷，也吃米和面，当然有电灯，去年去旅游的人可多了，旅店住不下，都住老百姓家里……家里人干什么都有，有跑运输的，也有种地的。俺们那的滑子蘑很有名，种50盘，一年也能收入上万块钱。”“你问为什么还来打工？还不是冲着大连这两个字来的。”“在电车上当车务员，打的是份国营工，老家的人可羡慕了。”

电车“哐哐锵锵”地跑着，她们身前挎着小皮包，默默坐在小凳子上，“她们现在还有当初这种感觉吗？”我想。

“我一个都不拉了”

好不容易上了几个赶海的老太太，可车门又关不上了。

车务员不愿意干有轨电车，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这一开一关都需要手动的木头车门。连拉了两下，于翠艳也没关上门，她又用力往上抬了抬，门还是关不上，“师傅，门又掉槽了！”于翠艳的司机和她老对儿都赶紧过来帮她关门，师徒三人合力，将车门抬起拉上，她们都怕车坏。车务员每天都有卖票的定额，除了基本工资外，每月按超额的30%提取奖金，按亏欠的100%扣钱。今天早班，中门车

务员的定额是 105 元，后门是 85 元。前天，腊月二十八，大连下了场雪，加上车坏，于翠艳亏了 60 多块钱。上车的乘客都有月票，到了第 10 站，中门的于翠艳才卖出第一张票。

有轨电车票价是三毛钱，不管坐几站。

车务员一天一天就是这样三毛三毛地卖够她们的定额。但她们怎么都没想到为了三毛钱的一张票，经常会挨骂，甚至挨打。

还是那天晚上，我坐在孙福娟的床上，这会儿，她们的思绪已经从青山沟的老家回到了电车上，孙福娟给我讲了最近她挨打的事。

这天她干中门，从电车后门上来一男一女，搬上一只彩电箱子、两只铁架子，孙福娟的老对儿说：你们这些东西，打一张票吧。那女人一听便道：“什么，从来没听说坐车东西还要打票。”接着她又骂起来：“从哪里招来些农村臭彪子（傻瓜、笨蛋），见钱眼开，就知道要钱……”

孙福娟听了后说：“你看看，这么些东西，打张票还过份吗？”

磨蹭半天，他们掏出一元钱递给孙买票，孙福娟撕下三张票，那女人一看是三张票又来气了，骂到了站，两乘客把东西搬到站台后，那男人回头对着孙的面部连打四拳……

回来越寻思越觉得屈，孙福娟哭了一晚上。车场领导来做思想工作：别想不开了，以后别为一张票这么认真，才三毛钱，不要就不要吧。“我心里想，俺们哪张票不是三毛三毛收上来的？还是 30 块收的！”

孙的表姐孙福霞也挨过乘客的打，她看见孙的嘴都被打肿了，也陪着掉泪，她说：“你别哭了别哭了，哭有什么用？等咱合同期满，咱们就回家。”

为什么一些城里人，穿得水光溜滑，一身衣服上千块，却不肯掏三毛钱买一张票？她们有些难以理解，一屋子宽甸来的姑娘都说不清楚，这时候她们显得沉默。但是，当她们在被人痛打时，失落了

向往已久的梦想，她们曾幻想不已的城市，裂开了。她们看到了城市人的另一面。

禚萍是第一批来的宽甸姑娘，已经在电车上干了一年多，外表看，她完全像是个城市姑娘，胖胖的，笑眯眯的，但她性子倔，要强。

宽甸姑娘自己说，挨打的大都是这种性格的人。虽然已事隔一年，但她跟我说起自己挨打的经过，脸都涨红了。

这是 1993 年底的一天，站台上的人密密麻麻，禚萍她们刚出师没多久。那天王春燕干中门，禚萍在后门，车装满了人，她们已经开始关门时，一个染发、浓妆，身着皮褛的女子和一个 1.8 米高的大男人朝中门冲过来。

眼见车门要关上了，穿皮褛的女人用手硬是将车门撑开，两人挤上车，这样车门就蹭了她的胳膊，那女人一站稳，抽手就给王春燕一巴掌，王赶紧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那女人还不饶她。王是个老实姑娘，后门的禚萍见她这样挨打，气火了。她硬是扒开挤得紧紧的人群，到了中门。

“你也太欺负人了，她都说对不起了，你怎么还打？”那一男一女立刻冲她来了，那男人照她的鼻子就是一拳。当时血就从她鼻子里流出来，“那天可把我气坏了，我也豁出去了。”当然她吃亏，那男人又高又壮。车下的调度过来了，车门一开，那一男一女下了车，打“的”跑了。

假如当时有一个乘客堵住门口，那两人说什么也跑不了，满满一车人，没一个站出来的。禚萍的眼泪含在眼圈里，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她指着一车人愤慨地说：“农村人就不是人吗？两个小姑娘，让一个大老爷们打，你们没一个人说句公道话，像你们这样没良心的人，我还拉你们干什么？”

她喊道：“老对儿，把车门打开，让他们全下去，我一个都不拉了！”她们真地把一车人全卸了……

这件事使 7 个宽甸姑娘一气之下跑回老家。

于翠艳的车到了终点站黑石礁，又一辆有轨电车“哐哐锵锵”地开过来。

从4时5分开始，每隔10分钟左右，就有一辆电车出库，到5点左右，早班电车基本上路。后边的电车开到近前了，于翠艳瞧了瞧说：“1030号车，是王霞她们。”

我下了1028号车，上了王霞她们的车。

“俺们快成变色龙了”

王霞今年16岁，长着两颗虎牙，一笑显得年龄就更小。

她们车上三个人的年纪加起来，也没这车的年纪大。王霞的脸和鼻子冻得通红，她说今天真冷，手都冻得不听使唤了。在等着发车信号时，那个二十多岁的司机和两个车务员，就在车厢里跨大步取暖，从车厢一头跨到另一头共有七大步。

6时30分了，乘客还是稀稀拉拉的，“往常这会儿，该是上班的高峰时间了，人多的时候，我们被挤得有时候都得站到车务员坐的小凳子上卖票，今天是年三十，大概工厂都歇了。”

这种跑铁轨的老式电车，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两三个城市还保留着。202路有轨电车，途经几家大厂，并通往一处重要的海滨旅游点，去年的客运总量至少有500万人次。

很少有人能想到她们有多苦。下雨了，一场暴风雨降临大连，宽甸姑娘们宿舍外的大树都被风掀翻了。

这天她们上晚班。

方宏利所在的电车跑跑停停，大雨很快就淹没了轨道，方宏利和老对儿跟着她们的司机下车，顶着雨站到铁轨上扒沙子，鞋也被水冲跑了。快半夜了，她们的车掉道，回不了库，她们只好背上皮包走回车场……

“那天可把俺们冻坏了，那天俺才卖了30多块钱。”

发水的第二天，她们是淌水上班的，油漆厂的油给水冲出来，花花绿绿，沾到她们的腿上、衣服上。

电车顶上的车弓坏了，她们就得爬到车顶上，用手举着备用的小弓，让车回库。举不了多长时间，她们的手臂就麻了，海边风大，吹得她们眼泪“唰唰”地淌。上级要检查卫生了，姑娘们就被派到车场搞卫生，还要沿着长长的铁轨，拣干净一路上的纸。

在大连，城市姑娘是不会干有轨电车这份活的，更不会像她们这样干，不偷懒，不惜力，不漏票……她们拥有许多城里人不具有的本份，那种像她们家乡的山水一样清新、纯朴、自然的东西，但她们却被一些城里人看不起，甚至见软就捏，见善就欺。她们保护自己的手段 只有一个，就是改变自己：竭力抹去乡下口音，穿最流行的衣衫裤袜，使用自己能买得起的化妆品。她们披上自己编织的保护网，却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你问来打工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收获，心理承受能力强了，什么滋味也都尝了，什么样的人都碰上了。有人说俺们现在快成‘变色龙’了，这也是给逼的……”

11时10分，她们下班了，我去了车场的票房，想给她们拍点照片。

这时，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说是这里负责的。

她问我干什么的？我掏出我的证件，她看完以后，说了一句让我有些意外的话：“你就是那个前几天晚上在宿舍待得挺晚的记者？”她的脸上没有笑容。正好这时候，孙福娟、任清两个宽甸姑娘上来了。

与我在宿舍里见到的不一样，在这位负责人面前，她俩变得拘谨和不自然，好像我们不曾认识一样。我把像机对准了柜子前的孙福娟，镜头里，我看不见那个女干部影子似地站在她的身后。

孙福娟是一个皮肤白晰、面目清秀的姑娘，性情温和友善。那天坐在床上讲她挨打的事，她的脸上也挂着一丝笑模样。可是现

在，她似乎笑不起来，我在镜头里突然捕获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一种莫明的不安和紧张，一份无法除却的陌生与隔膜。

我问她们：“现在最能让你们乐的事是什么？”“过生日，领导给送蛋糕？”“年底发了一大笔奖金？”

但她们好像一下被问住了，停了一会儿，有人才冒出一句：“领导冷不丁来了个令儿，让俺们回家过年！”经这一说，她们才回过神来，且就这话题七嘴八舌，好像她们明天就要上路。

在城市，她们才知道农村人是另外一种人或一类人，才真正体会到出生而为农村人的种种不快乐、不平等，她们怨过自己的命吗？尽管城市远比家乡繁华，但她们说起青山沟的时候，我听不出她们对家乡有一丝鄙薄。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疼爱、想念她们的人在哪里？

最温暖的家在哪里？

接到家人薄薄的信，她们往往泪流满面。

“再见了，电车”

今天是年三十，下午，车场就开始给不能回家过年的宽甸姑娘们发东西，水果啦，油炸食品等等，每个宿舍还分了一小箱的烟花爆竹，每人一个小红包，里边装着 40 块的压岁钱。晚上，车场沾点官的人都来陪她们过年，唱歌、猜谜、打鼓什么的，夜里 11 点多钟，领导们领着她们出去放鞭炮，然后回来吃饺子……

1993 年第一批来的打工妹，仍有 22 人续签了新一年的合同，她们成了师傅，有些人则转到了小公共汽车上。

在我就要结束采访时，我看到了已经回老家的孙福梅留下的那篇演讲稿。她合同期满就回去了。她要在大连当一个优秀车务员的梦想，被那个乘客的耳光打得烟消云散。

在这篇演讲稿的最后，我看到了这个姑娘一段声泪俱下的话：

“明天我就要走了，我将永远与这个工作告别。这一年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占着很重的位置，因为我知道了，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再受挫折，希望与现实出现矛盾时，我都会在心里珍藏一份期待，一份期待就是一颗不灭的火种，一份期待就是一张升起的风帆。在我真地要走时，我要默默地对你们说一声：再见了，熟悉的电车，再见了，熟悉的轨道，我会永远记着你们，并谢谢你们！”

“孙福梅真坚强！”青山沟的姑娘夸赞道。“在台上，她的眼泪‘哗哗’流，还是一气儿念完了发言稿。听着听着，俺们宽甸来的姑娘全哭了……”

从第一辆外号叫“美国大木笼子”的电车运行起，老式有轨电车已经在这座城市跑了 86 年。在大连市所有的公交车里，有轨电车是早晨发车最早，夜里收车最晚的，最末一班有轨电车的发车时间是午夜零时 30 分。

此刻的大连，万家灯火，万家团圆。

临近午夜，鞭炮声惊天动地，成千上万的人在点燃鞭炮的同时，也点燃着一声声祈盼、一句句祝福。

一年过去了。一年又走来了。

那些跑起来“哐哐锵锵、哐哐锵锵”的老式电车，那些曾载有无数悲欢故事、失望与梦想的老式电车，也将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驶进又一个新年。

明天，大年初一，202 路有轨电车上宽甸来的姑娘们，还上早班。

（写于 1995 年）

北京女记者与陕北歌王

“羊格肚子手巾嘴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嘴，拉个话话难。”

李亚熔站在延安火车站时，是1995年腊月廿二。

火车到站时是凌晨，天还黑着。李亚熔独自走出站台，西北风吹到脸上又干又冷，一个人站在夜色里，望着啥也看不见的延安，她突然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儿神经不正常。让这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一下子从北京跑到延安的理由，听起来简单而又不可思议。

几天前，在延安办公司的马大哥，给李亚熔的丈夫打电话，聊着聊着，马大哥随口说了一句：“你爱人不是喜欢唱民歌嘛，我们这儿有个司机唱得可好了。”李亚熔一听，赶紧抢过电话问会唱些啥？说会唱这会唱那，还会唱《泪蛋蛋》。一听《泪蛋蛋》，李亚熔顿时来劲儿了：“《泪蛋蛋》，我找好久了，你让他现在就给我唱唱，在电话里唱。”马大哥开玩笑地说：“你要想听，就自己到延安来。”

李亚熔真要去延安，她的丈夫说，真想去，等回西安的父母家，好好地过个年，十五过了再去也不晚。可李亚熔非去不可，一天也不想等。

两个月后在北京，我三更半夜坐在她家里，听她讲当时的心情，李亚熔说：“也不知怎么了，急得不行，心里有种感觉，非去不可，好像听不到《泪蛋蛋》，年也过不了似的。”

来火车站接李亚熔的是马大哥和彭大姐，他们都曾是北京知

青。吉普车在黑暗中跑了快一个钟头，朦朦胧胧中，李亚熔看见前头竖着一座高高大大的门，马大哥用手一指，说：“到了，安塞县城。”

洗把脸，李亚熔就要听歌，马大哥说：“急啥，《泪蛋蛋》在这儿流传了 1000 多年，还能跑了？”吃过早饭，他对人吩咐道：“去，赶紧把司机曹六叫来。”

曹六，二十五岁，土生土长的安塞人，哼民歌对他像吃饭一样平常，“这有啥嘛，人人都会唱嘛”。曹六一到，就坐在招待所的椅子上开唱。唱了一首又一首，曹六唱起了《泪蛋蛋》：

“羊格肚子手巾哟三道道蓝\咱们见个面不容易哟\拉个话话
难。

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个话话哟\就招一
招手。

撩见那个村村哟\撩不见那个人儿\我泪个蛋蛋哟泡在沙窝窝
林……”

曹六唱得平平淡淡，李亚熔却激动得不行：“泪个蛋蛋哟，可找
到你了！我以前听的那些民歌，算什么呀，这土得掉渣儿的民歌，才
是真正的民歌，听了才过瘾呵！”

见她是真的爱听，曹六说：“我唱得不好，有一个人唱得可好，
在安塞可出名，也是沿河湾人，我和他沾点亲，叫外爷（外公）。”

李亚熔赶紧让曹六领着去找他外爷。他们穿过县城，走了半个
钟头，到了山根底下一排窑洞前，大铁门上挂着锁，外爷不在家。

曹六让李亚熔坐在门口的柴火垛上等，自己下坡去找。过了两个
钟头，见曹六跟一个四十七八岁的汉子，勾肩搭背地上来了。这
汉子，就是曹六的外爷贺玉堂。